

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现实域: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现实的感性世界〔*〕

○ 李天慧¹, 陈永盛²

(1.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2.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近年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再次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但无论是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维度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从资本主义特殊运行规律的维度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首先都应明确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现实”为前提的,是对“现实”的探究。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的探究就是对“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现实的感性世界”这三个现实域的探究。对这三个现实域本身进行廓清和澄明,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现实”前提,以期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提供一个明晰的现实域作为前提性规定,断续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生产活动;现实的感性世界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6.015

近年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再次引起学界的重视,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得到重大的推进,尤其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但无论是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维度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从资本主义特殊运行规律的维度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首先都应明确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现实”为前提的,是对“现实”的探究。这是规范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前提,也是深入历史唯物主义深处,抓到历史唯物主义深层要义的关键。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的探究,就是对“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现实的感性世界”这三个现实域的探究。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具体是如何对这三个现实域本身进行界

作者简介:李天慧,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陈永盛,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历史哲学研究。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宣传协同创新中心”的阶段性成果。

定的？这是开展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首先必须要明晰和澄明的问题。

一、现实的个人

人的“斯芬克斯之迷”一直是困扰哲学家们的难题。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家不是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就是把人对历史的关系从自然中排除出去，因而造成了人与现实的脱离。按照他们的见解，对“人”的追问，就成了是对人的本质主义的追问。因此，人在他们那里就成了哲学思辨的构成因素。

可以说，这是哲学史上“认识你自己”的忠告的失败，是要求哲学家对“人”进行正确理解的失败。不难发现，这种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站在现实的基地上把人看作是现实的个人，不是把人从自然中独立出来，就是把人从历史中独立出来，并且总是追求那个不变不动的“纯粹人”，因而忘了每个人所遇到的现成东西都是他们的“纯粹人”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形而上化了的人的现实基础。面对这种既成范式，马克思在他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其进行了革命，他把人放在现实中进行界定，即把人看作是同时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现实的、有个性的个人，并从现实的个人的最大现实——处在阶级关系中——出发，昭示现实的个人要从“阶级的个人”回归到“有个性的个人”这一本真存在上来。

如果说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把人看作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而在《神圣家族》中虽然摒弃了这种人本主义立场，但却又陷入哲学批判的语境中去，从人的本质方面来批判“批判家”们的“人的本质”。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实现了把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规定的“是属于一定社会形式的”现实的个人进行全面展开。首先，马克思确认“人”是“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人的这种首先以“有生命的个人”的身份出场，表明人首先具有自然属性，即人是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生物所具有的形态、特征和本能等，可以用生物学对其进行界定。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又明确指出，当人由其“肉体组织”的生物内驱力驱使人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时，人就已经和动物区别开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的手稿中删掉的一句话那里，马克思指出，有生命的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思想就与动物相区别开，而是在他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时就表明了他们不是动物而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这就是说，“有生命的个人”一开始就表明自己不是动物，不禁锢于自身的自然属性中。在他看来，人除了是自然存在物外，也是社会存在物。也就是说，人除了是自然存在物而存在，因而具有自然属性之外，同时也是社会存在物，具有社会属性。可以说，社会属性是人之成为“人”的关键。因为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承认，使人成功地从“纯然”的“有生命的个人”变成“复杂”的“现实的个人”。马克思这一创见使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超越了一切旧哲学观，特别是在对人的理解的维度上。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对具有社会属性的现实的个人进行探究的呢？在标注

着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马克思不仅在批判费尔巴哈的过程中指出,“现实的个人”并不像费尔巴哈所认为的那样只存在“爱”和“友情”的关系,而是具有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并且,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面向现实生活,指出人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之中的,而且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从事生产活动的人,这是人之所以具有社会属性的关键所在。

此外,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3]换言之,“现实的个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外,还具有精神属性。人具有精神属性,这是哲学家们所承认的一个事实,也是哲学家们常常借以区分人和动物的重要凭证。黑格尔就曾指出,“认为人通过思维而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这是一种古老的成见,一种已变得陈旧的说法。……当然也将是正确的。”^[4]然而,虽然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内的哲学家都指认人具有精神属性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但与黑格尔用思维强奸人性,认为一切人性的东西之所以是人性,都是通过思维而得以形成的,并且是唯独通过思维才得以理解的见解不同,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属性当成是主格性的东西,而只是把它当成人所特有的一种主观能动性或自觉能动性。也就是说,人不仅具有知、情、意等的精神属性,还能运用自己的意识作用于与人相联系的对象。列宁将其表述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5]。以上主要是从人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三个方面来廓清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界说,这也是学界在“现实的个人”这一课题上常见的解读。但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深入耕犁发现,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关于“现实的个人”的界说并不单单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对马克思来说,“现实的个人”的最大“现实”就是“个人”是处于既有历史条件和关系的范围之内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种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鲜明地表现为个人隶属于一定的阶级,这是说,现实的个人处在彼此对立的阶级关系中,以“阶级的个人”的身份出场,即现实的个人是“阶级的个人”。与此同时,马克思指出,现实的个人处在对立的阶级关系这一现实中,只有无产阶级自身才能宣告这个“现实”本身的终结。

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从这种现实的对立的阶级关系中挣脱出来,终结这种现实的阶级关系,最终回复他自己本身,称为“有个性的个人”。那么如何才能使现实的个人由现实的“阶级的个人”回归“有个性的个人”呢?对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给出了明确的解答:“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6]但并不是所有的共同体都是能使人成为“有个性的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就不是真正的共同体。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共同体是那种各个人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生存条件的并得到了发展了的无产阶级的共同体。也就是说,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由从前作为受偶然性支配并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与个人相对立转变成是受个人自己控制

并与个人自己同一，即各个人都成为“有个性的个人”。而这种“有个性的个人”也就是马克思所毕生追求的那种共产主义的“个人”。

思及至此，不难发现，马克思所理解的“现实的个人”不仅在其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上彻底颠覆了传统哲学的“纯粹人”，而且以“现实的个人”是集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于一体的特质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批判家们对“人”的玷污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同时也昭示了要使“现实的个人”从现实中的“阶级的个人”的存在返回到“有个性的个人”的本真存在中去。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现实域（“现实的个人”）的廓清和明晰。

二、现实的生产活动

但如果只是停留在对“人”在哪些方面体现了其是“现实的个人”的分析上，而不就“现实的个人”必然是从事物质生产的这种特质进行探究，则必然回答不了“现实的个人”何以就是“现实的”个人这个更深层的问题，深入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理解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本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本质上，“现实的”个人是指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从事生产活动的个体存在和类存在合一的个人，而“现实的生产活动”则构成了“现实的”个人的存在基础。也就是说，“现实的生产活动”是“现实的个人”之所以“现实”的本真定在，是进一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现实域”的深层要义的关键。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更深层的“现实域”进行界说的呢？

其一，“现实的生产活动”是革命的、改造世界的活动。生产活动，按其本意理解，应是特指生产工艺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理解，即把生产活动理解为是人类作用于世界（对象）从而使世界（对象）成为人类所希望的样式呈现出来或使世界（对象）满足人类的需要的手段或途径。这样，我们在这里就不再把劳动、实践和生产活动进行区别理解。但无论是狭义的理解，还是广义的理解，生产活动本身都应是现实的，即现实的生产活动。这是说，生产活动必然是现实的、感性的，不存在抽象化了的生产活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明确指出：“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7〕}但即使撇开唯心主义并承认生产活动是感性的、现实的，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正确地理解“现实的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的批判语境中，费尔巴哈就没有对“现实的生产活动”形成正确的认识。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是对象性的活动，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8〕}也就是说，费尔巴哈没有把握到“现实的生产活动”的应有之义，即“现实的生产活动”是革命的、改造世界的活动。

那么，为什么说“现实的生产活动”是革命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呢？或者更直接地说，马克思是在什么层面上把“现实的生产活动”理解为是革命的、改造世界的活动的？要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现实的生产活动”理解为革命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就必须清楚马克思的理论主题和目的，只有把其放到马克思的理论主

题和目的中,才能对其实实现彻底的明晰。与传统哲学把追问“世界何以可能”作为理论主题不同,马克思把诉求人类解放,为人类解放“盗取天火”作为自己的理论主题。实现人类解放,使每个人得到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也是他的理论旨趣和目的所在。在马克思看来,现存的一切存在都是不合理的,是异化的存在。人类要获得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改变这种异化的现状,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明确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9]这也是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的旨趣和目的所在。这表明,马克思理论旨趣和目的就是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可见,从马克思的毕生追求和理论旨趣与目的来看,马克思对“现实的生产活动”的定位当然是要放在革命的、改造世界的品格上,是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改变那种异化了的现状;而非像费尔巴哈那样只是把其理解为是对“市民社会”的直观。

其二,“现实的生产活动”是建构历史的原初关系的活动。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在与历史的作用关系上,“现实的生产活动”首先是建构历史的四重原初关系的活动。“现实的生产活动”被界定为是建构历史的第一重原初关系的活动,是指“现实的生产活动”最初表现为是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本身。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重原初关系就是人们生产满足吃、喝、住、穿等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保证人类能够生存下来的第一个要素,而只有人类能够生存下来才能从事其他的历史活动。可见,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历史的第一重原初关系,是开展其他任何别的活动的前提。为此,马克思还对那些思辩的“德国人”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从来没有站在现实生活世界的立场上来理解历史,因而他们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物质资料生产这种生产活动看作是人类史的第一前提,也没有对其进行过认真的考察,而只是把它当作从属于思维批判的活动。对此,马克思说:“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1]

“现实的生产活动”被界定为是历史的第二重原初关系的建构活动,是指“现实的生产活动”是再生产,即满足新需要的生产。马克思认为,当人类的第一个需要本身,即物质资料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新的需要,而对这种新需要的生产就成了第一个历史活动。马克思对“现实的生产活动”的这层界定,不仅实现了对“德国人的伟大历史智慧是谁的精神产物”这一问题做出最有力的回答,而且同时也对“德国人”热衷于“史前历史”这个历史思维进行了彻底批判。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德国人”之所以热衷于“史前历史”,特别是热衷于思辩的批判,不愿意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未能认识到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是他们能够进行思辩批判的前提。

马克思认为,构成历史的第三个原初关系是人自身的生产。人自身的生产

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后续，人们一开始就进入了历史的这种发展进程。这种人自身的生产就是繁殖，即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生产另外一些人。这种生产表明它属于一定关系的创造，因为繁殖的结果首先就形成了家庭关系。马克思指出，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关系。但随着需要的增长以及人口的增多所伴随的新需要的出现，社会的关系就打破了原初的家庭结构，家庭也就变成了从属的关系。至此，马克思分析了三种建构历史的生产活动，即满足生存的生产，满足新需要的再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指出这三个生产活动并不是建构历史的三个不同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生产活动的三个方面，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12]与此同时，在这三重历史关系中，“现实的个人”无论是从事何种历史活动，只要它形成生命的生产，它就自然地形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其中，自然关系对应的是人与自然的结合，但更多的是指人作用于自然，从自然中索取维持生命生产的资料。而社会关系则是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这是“现实的生产活动”建构历史的原初关系的第四个方面，即关系的生产。

其三，“现实的生产活动”是历史本身及其发展过程的建构活动。除了上述对“现实的生产活动”进行定性，将其界定为是革命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以及在其与历史的原初关系方面判定其是建构历史的原初关系的活动之外，马克思还在历史本身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这一层面对“现实的生产活动”进行界定，认为“现实的生产活动”是历史本身及其发展过程的建构活动。但在对“现实的生产活动”进行这层界定上，在马克思看来，过去的一切旧历史观都未能形成科学的认识，历史对它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编纂史”。因为在那些旧历史观看来，历史及其发展过程是由思辩的批判活动所建构的，而不是由“现实的生产活动”所建构的。同样，在生产活动的作用下所形成的那些生产力、资本、社会交往形式等现实基础被旧历史观当作是某种与历史无关的东西，被当作是与历史及其发展过程本身无关的东西。这是说，在旧历史观那里，“思想”“观念”等思辩的东西代替了人的生产活动成为历史本身及其发展过程的建构活动，并且起支配和决定的作用。对此，马克思以批判那些“德国人”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为例对其进行了彻底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在德国历史哲学中，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被归结为不是由思辩的演绎来建构，就是由宗教幻想所建构。继黑格尔把历史本身及其发展过程看作是绝对精神的最纯粹的外化过程后，圣布鲁诺把历史本身及其发展看作是一个吞噬一个的一连串的“思想”的演绎。而施蒂纳则直接把历史当成是神作用下的历史，他认为我们之所以会形成历史的幻觉，是由于我们对宗教的信仰；因此，要想摆脱这种幻觉，就必须对宗教进行批判，对神学信仰进行批判。对此，马克思批判到：“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宗教的观点：它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13]总的来看，这些理论家们把建构历史的工作交给了“神

人”“大写的人”“唯一者”，历史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大写的人”“自我意识”“唯一者”进行“批判”所构成的争吵过程。

与此不同，马克思认为历史本身及其发展过程是由“现实的生产活动”所建构的。尽管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生产活动）就以否定和异化的方式作用于历史。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异化劳动，还是为追逐剩余价值的最大化而造成劳动本身畸形发展，历史总是在劳动的作用下形成。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14]这表明历史是由“现实的生产活动”所建构的。此外，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发展过程本身也是由“现实的生产活动”所建构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劳动分工与所有制形式的关系以及随着单独个人的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历史也就转变为世界性历史，这两个方面表明“现实的生产活动”建构着历史的发展过程。而在后来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及其手稿等文本中，马克思虽然更多的是对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本身进行剖析，批判在资本逻辑作用下社会历史呈现出来的恶的一面，但他从来没有怀疑或否认过他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仅表明它本身就是现实的历史，以此颠覆唯心史观的思辨历史，而且历史本身及其发展过程就是由“现实的生产活动”所建构的，即“现实的生产活动”建构历史本身及其发展过程。

通过上述借助于对“现实的生产活动”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廓清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域，但这还未能就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前提形成一个完全明晰的界定，还需对其再深入探究，直捣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三个现实域，即“现实的感性世界”。

三、现实的感性世界

“现实的感性世界”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对“现实域”进行界定的第三个方面。从上述的分析不难看出，“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现实的生产活动”的有生命的社会性的个人，而这个“现实的个人”所从事的“现实的生产活动”的作用对象就是他所处的那个现实的感性世界。事实上，把世界还原为“现实的感性世界”不仅使马克思在对“世界”的理解上超越于一切旧哲学的思辨理解，而且在根源上明晰了他自己的唯物史观的研究域。

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三个现实域（“现实的感性世界”）的界说主要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在那里，与其他命题的论证逻辑一样，马克思对“现实的感性世界”的界定同样是在批判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对该命题的错误理解的同时阐明自己对该命题的新看法。在对“现实的感性世界”这一命题的理解上，费尔巴哈把感性世界确认为感性现实，但他很快就停留于此，他认为对待感性世界我们只需单纯的直观或单纯的感觉就可以了。对此，马克思指出，虽然费尔巴哈把感性世界确认为感性现实是正确的；但他只停留在对感性

世界的直观上,从而把感性世界当成就是直观所呈现的那样,并且是一直都如此地存在着的,因此这种做法又是不对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没有认识到我们所直观到的感性世界其实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历史活动的产物,而不是像直观所呈现的那样感性世界就是如此地存在的。对此,马克思以樱桃树为例进行佐证。马克思指出,樱桃树和其他果树一样,它的存在可以是“自然”的,但它能够被发现和利用则是由于商业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此外,马克思指出,只要不以形而上的方式而是以经验的方式来理解感性世界,那么对于那些存在感性世界中的所谓深奥的哲学问题同样是可以用来解疑的。可以说,这与马克思用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现实的个人”和“现实的生产活动”是相对应的。例如在人与自然的问题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特别是布鲁诺,往往把它臆想为是关于世界的创造的形而上的甚至是神学的问题。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堪一击,只要把它放到工业中就会自行消解。同时,马克思认为,甚至自然科学也是由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才得以形成的。这是说,如果没有这两者的作用,没有人们的感性的现实的生产活动,那么感性世界本身也就不可能存在,更不用提用自然科学的认识去识破自然的秘密了。当然,马克思并不否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性。但他认为要承认自然界的这种优先性,或者说承认存在那些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就必须把人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才有意义。否则只要把人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把人与自然界相结合,那么自然界的优先性就会立刻自行消失。但如果把人及属人的存在悬置起来,那么即使承认自然界的优先性,也是毫无意义的。

不难发现,马克思对“感性世界”的上述论说主要是奠基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特别是费尔巴哈的错误理解之上,并没有给出正面的定义。那么,马克思是否从正面阐明过“现实的感性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吗?通过透视马克思的文本不难发现,马克思除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批判费尔巴哈在历史领域重新陷入唯心主义之处提到:“可见,他(费尔巴哈——笔者注)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5]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带有对感性世界进行定义的说明了。然而,这里所表达的对感性世界的肯定说明其实也是内含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的否定语境中的。这就是说,费尔巴哈所没有理解的真实的感性世界其实就是他所没有认识到的感性活动,感性世界就是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我们认为,马克思对感性世界的这一说明主要包含以下三个要义。第一,感性世界是由现实的个人所构成的世界,也就是说,世界是现实的人的世界,现实的个人是世界得以成为世界的细胞。感性世界是属人性的,而不是纯天然的自然世界或动物世界。第二,除了承认感性世界是由现实的个人所构成的世界之外,还必须明确现实的个人是用其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来建构这个世界的。也就是说,感性世界是现实的个人的“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所创造的产物,而不是现实的个人的思辨产物。第三,感性世界是现实的个人与“活生生的感性活动”互为一体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

个人”与“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相对立或相分离的世界,因为只有两者互为一体才能保证这个世界是由现实的个人的“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所构成的。

事实上,除了如上述那样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批判中阐明自己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之外,马克思在他的整个唯物史观的建构中都内含着对感性世界的科学剖析。因为唯物史观的阐述就是对感性世界的哲学分析。比如生产与交往的关系、劳动分工与所有制形式的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等等,无不是属于对感性世界进行界说,甚至对共产主义的诉求也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物质前提。首先,就生产与交往的关系来看,生产力对交往形式(社会关系)起支配的作用,前者决定着后者,当旧的交往形式不再符合发达的生产力时,它就会成为桎梏并引起社会革命,最终以新的交往形式取而代之并推进历史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对感性世界的发展动力的探究。其次,在劳动分工与所有制形式的关系中,劳动分工的各个阶段决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自然产生的劳动分工对应的是部落(氏族)所有制;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对应的是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而进一步的劳动分工推进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商业同工业的分离,对应的则是从行会制度到工场,再到大工业。这是马克思对感性世界的存在形态的变迁状况的“从后思索”。再次,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则在于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指出,“意识(das Bewuss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Da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6]这是马克思强调的对感性世界进行解读时所要遵循的唯物史观的前提规定。最后,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虽然每个人都得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本身又必然是属于感性世界的,只不过是属于对感性世界的理想状态的诉求。可见,整个唯物史观的展开都是对感性世界的科学剖析。

综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现实”为前提的,是对“现实”的探究。而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的探究,就是对“现实的个人”“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现实的感性世界”这三个现实域的探究。只有准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前提性规定,全面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三个现实域,才能深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中去,抓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要义。同样,准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前提性规定,全面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三个现实域,对于我们继续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注释:

[1][2][3][6][7][8][9][10][11][12][13][14][15][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519、185、519、533、571、499、499、527、502、531、532、546、540、530、525页。

[4][德]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30年版)》,薛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5]《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2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